

从离“家”到回“家”

——论近代以来中国家庭批判的现代性后果及其伦理救赎

吕辉

(陕西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陕西西安710061)

摘要:为了追求个人的自由和解放,近代以来中国人以一种激进的态度对传统家庭伦理进行了猛烈的抨击,结果导致传统家庭功能不断地弱化;与此同时,新型家庭伦理并没有真正建立起来。由于传统家庭功能的弱化和新型家庭伦理的缺乏,在现代陌生人社会漂泊的中国人难以找到真情实感的慰藉,人与人之间的冷漠与紧张,使孤独与焦虑成了现代中国人的一种基本生存状态。道德情感需求是人的本性需求,家是培育人的道德情感的根基。新时代中国人需要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指导作用,调和自由与责任的关系,在返本开新中不断推动传统家庭责任伦理的现代性转换和创新性发展,以责任伦理为中心构建新型家庭伦理;同时还要构建新型家庭责任伦理实践的多元推进机制,使其真正渗入到现代中国人的家庭生活实践中。

关键词:家庭;自由;现代性;责任伦理

中图分类号:B82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7192(2024)01-0092-09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不论时代发生多大变化,不论生活格局发生多大变化,我们都要重视家庭建设”^[1]。“千家万户都好,国家才能好,民族才能好”^[2]。家是社会的最基本单位,家不仅与个人的幸福生活有关,也决定着社会的安定和国家的未来。“自新文化运动以来,‘家’与家庭关系一直背负着一定的思想史骂名”^[3]。“‘家’在近代中国遭到国人摧枯拉朽地批判清算”^[4]。“家”是人美好生活的根基,近代以来对“家”批判和清算带来了严重的家庭和社会问题,如何重建家庭伦理,已成为当代中国学术界的一个重要论题^[5]。本文认为,现代中国人个性自由的过度张扬,是导致家庭批判现代性后果的重要原因,构建新型家庭伦理是救赎中国家庭批判现代性后果的根本出路。

一、离“家”出走:激进的自由追求及其冲击

中国传统家庭伦理是一种等级伦理。一是长辈与晚辈之间地位悬殊。“每一个家都有一家长为

统治的首脑。他对家中男系后裔的权力是最高的,几乎是绝对的,并且是永久的。”^{[6]5-6}“父为子纲”赋予父亲对子女的绝对支配权,婚姻上“男不亲求,女不亲许”,必须由父母包办。家长对家属惩罚时,家属不应怨恨。即《礼记·内则》所说:“父母怒,不悦,而挞之流血,不敢疾怨,起敬起孝。”二是男女之间地位悬殊。“夫为妻纲”“男主女从”的要求体现了男性在家庭中的绝对主导地位;女性则处于被支配的地位。为了让女性服从男性,传统“家”文化要求女性做到“三从四德”。

自由是人的本性,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本诉求。有别于传统社会,现代社会崇尚个人权利、张扬个性自由,反对外在的干预和支配。在传统向现代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压制个人自由的“家庭是传统和现代性之间斗争的场所”^{[7]147},传统“家”伦理受到激烈的抨击。五四新文化运动就以激进主义的态度批判传统家庭专制,以求释放人的个性。鲁迅《伤逝》中的新女性子君喊出了,“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为20世纪的中国新女性追求“个性自由和解放”设立了新方式——“离家”,并建立了“出走”的概念。鲁迅还批判作为传

收稿日期:2023-08-23

作者简介:吕辉(1979-),女,陕西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为文化哲学与古代文学。E-mail:lvhui_1979@163.com

统“家”伦理的礼教是“吃人”的礼教^{[8]447}。陈独秀倡言:要“尊重个人独立自主之人格,勿为他人之附属品”^[9],中国的伦理变革应“以个人本位主义,易家族本位主义”^[10]。胡适也指出:“社会最大的罪恶莫过于摧折个人的个性,不使他自由发展。”^{[11]34}因此他说:“我所最期望于你的是一种真益纯粹的为我主义。要使你有时觉得天下只有关于我的事最要紧,其余的都算不得什么。……全世界都像海上沉了船,最要紧的还是救出自己。”^{[11]32}胡适主张在个人利益与家庭利益发生冲突时,要以“巩固个人利益为本因”。胡适的新诗《我的儿子》声言:“我要你做一个堂堂的人,不要做我的孝顺儿子。”^{[12]168}1918年胡适翻译了《玩偶之家》,离“家”出走的女主人公“娜拉”成为五四新女性的偶像。“娜拉出走”的行为成为了个性自由的象征和镜像,这一行为符号不仅代表了摆脱家庭束缚的可能性,也象征着求得一个独立且闪亮的自我。通过这样的行动,人们被鼓励去追求个人的精神解放和自我实现。傅斯年和李大钊也把传统家庭伦理视为摧残人的个性的“万恶之源”^[13]。巴金批判传统家庭伦理的《家》《春》《秋》受到当时年轻人的热烈欢迎,就是因为其反对传统家庭禁锢,追求个性解放。最为惊世骇俗的主张是取消家庭制度,如鞠普在《毁家谭》中主张:“复多设会场旅馆,为男女相聚之所,相爱则合,相恶则离,俾各遂其情,则必无乐于婚姻者矣”^{[14]125}。在激进自由思想的鼓动下,离“家”出走、抛弃家庭成为五四时期中国人展示“新潮”的最佳方式^{[15]72-73}。

新中国成立后继续对传统家庭伦理进行抨击。1950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规定了男女婚姻自由,“明确地反对家庭权威而使家庭的传统权力”中性化^{[16]141},由此导致了离婚数量的急剧上升,一些妇女常因一些家庭小矛盾、小摩擦,就要离婚。有档案记载,“有些妇女对自己的终身大事不多加考虑有草率解决婚姻问题的现象,如夫妻俩素来没有什么问题,只因一次口角即提出离婚。”^[17]“陇县贫农周家冕的媳妇,一天要吃好穿好,丈夫、婆婆不敢吭声,一次她要吃鸡肉未买,就跑到法院要离婚。”^[18]离婚竟然成了一些妇女随意用来出气和整男人的工具。有些人认为妇女地位提高和自由就是要压制家庭其他成员包括公婆。相关档案记载:“西乡县文贯乡任耀得的儿媳,嫌公公老了不

能做活,时常虐待,逼得老汉投河寻死。”^[19]“榆林三区一乡二官山甄优子之妻高束和婆婆不和,婆婆上吊自杀。”^[20]到1980年代,以“彻底反传统”为旗号的文化激进主义,认为传统伦理文化堵塞了中国现代化的通道,因此必须坚决地对传统家庭伦理进行批判。改革开放后,市场经济的发展对传统家庭伦理造成了更大的冲击。波兰尼指出:市场“契约自由原则的推行,这意味着非契约关系,诸如亲属关系,邻里关系,同业关系和信仰关系等都将消灭掉,因为这些关系要求个体的忠诚并因而限制了他的自由。”^{[21]63}经济理性的市场机制侵入家庭领域,表征之一就是个人主义的自我中心式泛滥,以及对传统家庭伦理的挑战和否定。

近代以来,中国人对个人自由的激进诉求割裂了个人自由与家庭责任的关系,在批判传统家庭专制的同时,也把个人自由诉求推向了反面,其结果是非常严重的。梁漱溟说:“中国固有的社会是一种伦理的社会、情谊的社会;这种风气、这种意味,在乡村里还有一点,不像都市中已被摧残无余。”^{[22]317}在当代中国,非婚主义作为对婚姻家庭的否定,在当下成为越来越多年轻人的选择。“我就是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怎么高兴怎么来。”^[23]西方家庭现代性问题的表征在当下中国也逐渐再现:“近两个世纪以来,作为社会日益城市化和工业化的一个反应,家庭的规模变小了,孩子越来越少,亲属关系变得不再重要。对个人权利的日益强调,使得婚姻不再被定义为一种是社会义务或经济上有利的结盟关系,而成为一种个人满足的来源——并导致离婚率越来越高。”^{[24]208}“合则留,不合则去”的个性自由追求使中国年轻一代不断刷新离婚率的纪录,“闪婚闪离”“婚外情”“丁克”等成了当代中国司空见惯的现象。

二、离“家”后的梦魇:现代中国人的生存困境

“离家出走”后个人自由的扩展是一个巨大的社会进步。但现代中国个性自由的过度张扬也带来了严重的负面效应,离家的自由割断了个体与家庭的纽带,导致传统“家”功能的弱化,使个人失去了家的关爱。爱是社会和谐和的黏合剂,是人际关系和睦的催化剂,是化解矛盾、仇恨、隔膜的良药。离

“家”后的中国人进入的是一个缺乏真情实感的现代“陌生人社会”,陌生人之间的生存竞争引发了人与人之间的冷漠和紧张,孤独与焦虑等一系列现代性问题越来越严重。

1. 家庭功能的弱化与“无家可归”

家庭功能的弱化的突出表现就是后家庭时代的显现。对此,德国学者乌尔里希·贝克发表过看法:“非正式婚姻或没有孩子的婚姻;单身父母、再婚,或同性伴侣关系;暂时的关系或终生的友谊关系;在不同的家庭生活甚至在不同城镇生活。这些中间的、次级的或流动的形式,都会出现在未来的家庭中,故而我称之为‘后家庭时代的家庭’。”^[25]后家庭时代的出现表明,家庭责任与义务、亲密关系的持久性在家庭关系中的重要性中已退居二线,这种转变的背后,是由于越来越多的个人开始根据自己的生活逻辑和原则来设计和构建家庭关系。

由此引发了家庭功能的进一步弱化以及放诸多家庭与社会问题。面对现代社会各种激进自由思想对家庭的冲击,还有学者认为家庭将来消亡。菲迪南德·伦德伯格说:“家庭已接近完全消亡的时候”。^[26]^[210]美国未来学家奈斯比特在《大趋势》中写道:“社会的基本建筑构件正在从家庭转变为单独的个人。”^[27]^[231]他们认为未来社会的基本生活单位将由家庭转变为个人,从而预见家庭的消亡。家庭功能的弱化与家庭的消亡将导致现代人的“无家可归”。

近代以来中国人“离家出走”进入了现代陌生人社会。随着传统家庭道德的逐渐隐退,法不禁止即可为,只要不违法,现代中国人追求对婚姻评价的趋向避免道德束缚,减少对他人的道德要求和期望。现代陌生人社会对个人的道德约束力相应减弱,舆论监督和他律环境逐步削弱,婚姻家庭的道德价值观念被大大削弱,结果进一步导致了婚姻家庭关系的不稳定和家庭功能的弱化。典型表现就是现代中国人不再视非婚同居、离婚为丑恶和羞耻,甚至支持、促进情感消退婚姻的解体,从一而终的传统观念受到了严重的冲击,不少人把离婚看成感情不和的夫妻追求自由、获取个人幸福的一种方式,婚姻关系的稳定性不断下降。还有一些人视婚姻感情为儿戏,婚前性生活比较随意,非婚同居、非婚生育较为普遍;婚外恋、婚外性关系日渐增多,甚至重婚纳妾等违法现象也时有发生。现代中国社

会大部分新生代是独生子女,“自我中心”倾向严重,责任感降低,传统的“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养儿防老”的观念已被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所抛弃;抛妻弃子和虐待老人的现象也不断出现。家庭功能的弱化使老人和儿童的失去了家庭的关爱,身心受到难以弥补的伤害,导致一些老人和儿童,特别是一些单亲家庭成员出现严重的心理以及精神问题。

2. 人与人之间的冷漠与紧张

情感是人最基本的存在方式。在现代社会,“每个人都以自身为目的,其他一切在他看来都是虚无”^[28]^[197],每个人都热衷于个人的自我算计,这样的人就变成了霍克海默和阿多诺所说的孤立的“单子”^[29]^[256]。现代社会把孤立的个人联系起来的手段是以工具理性为支撑的现代化管理方式,这种管理方式只是用一种策略方法而非真情实感把人机械地结合起来。在生产劳动中,现代人对于自然界采取一种物化的态度,并且也把这种态度用来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把其他人都当作物来对待^[29]^[61]。因此,现代人变成了受工具理性控制的机器人,对物对人讲制度而不是讲情感。弗洛姆指出:现代社会“人的关系,实质上,是疏远了的或异化了的机械般动作的人的关系”^[30]。结果使现代人变成“脆弱而又迟钝的个体,必须去忍受生活的秩序,期间,他发觉自己根本没有爱的情感,只有一种发泄在自己身上的内倾的暴力”^[29]^[257]。现代社会的管理方式使人与人之间变的冷漠无情。阿多诺和霍克海默说,“工业化却把人的灵魂物化了”^[29]^[25]。社会达尔文主义也在现代社会盛行,受其影响现代人可能暗中算计,也有可能明里打斗。霍布斯说:“任何两个人如果想取得同一东西而又不能同时享用时,彼此就会成为仇敌。他们的目的主要是自我保全,有时则只是为了自己的欢乐;在达到这一目的的过程中,彼此都力图摧毁或征服对方。”^[31]“人性竟然会使人们如此彼此互相离异、易于互相侵犯摧毁,这在一个没有好好考虑这些事物的人看来是很奇怪的。”^[31]

随着中国人逐步步入现代陌生人社会,匿名式的交往、不确定的行动和非持续性的人际关系使得生存风险增加,信任危机凸显。卢曼和吉登斯认为,信任是“对一个人或一个系统之可依赖性所持有的信心,在一系列给定的后果或事件中,这种信心表达了对诚实或他人的爱的信念”^[32]。在现代陌

生人社会中,人与人互相不了解,不知道对方的道德品性,对于自身的名声,名誉就没有那么多的顾忌,在人与人的交往时,信任很容易缺位。与过去紧密相连、相互扶持的熟人社会相比,现代社会中的人际关系常常表现为冷漠、疏远和紧张。人的行为很容易超越于善恶边界,羞耻感、负疚感被连根拔除。现代中国社会已患上了严重的冷漠症:一是旁观者的冷漠,表现为旁观者的见死不救或见危不救,甚至“趁火打劫”;二是受助者的冷漠,表现为受助者对救助者缺乏感恩之心,甚至受助者对救助者“恩将仇报”;三是施害者的冷漠,主要表现为施害者基于一己私利而置他人的生死于不顾^[33]。还有学者将现今中国社会表述为“互害型社会”^{[34]53}。在这样的社会生态链中,大多数人无法避免伤害他人或遭受被伤害的局面,这种状况不分职业、种族、性别、社会阶层或年龄。因此,在现代中国社会“一切皆虚妄”支持着狂纵不法的“一切皆允许”,不可避免地导致人际关系的紧张。

3. 生存的孤独与焦虑

现代社会人与人之间交往很难找到“人们在共同体里与同伙一起,从出生之时起,就休戚与共,同甘共苦”^[35]的情感。用弗洛姆的话说就是,“他自由了——也就是说,他孤独无助,倍受各方威胁。……天堂永远失去了,个人茕茕孑立,直面世界,仿佛一个陌生者置身于无边无际而又危险重重的世界里。新自由注定要产生一种深深的不安全、无能为力、怀疑、孤单与焦虑感”^{[36]44-45}。“新的自由带来不安、无权利、怀疑、孤独及焦虑的感觉。”^[36]由于脱离家赋予的安全感。“一方面,他变得更加自立自主,而且不满现实,喜欢批评。另外,他也觉得更加孤单无依,并产生一种惶恐不安的心理。”^{[36]35-36}“这个世界与某个个体存在相比,显得绝对强大有力,导致个体的软弱感和焦虑感。”^{[37]20}。弗洛姆指出:现代社会“虽然每一个人尽可能地努力同其余的人紧密结合在一起,但是每一个人还是极度的空虚和寂寞,每一个人充满了强烈的不安全感、焦虑感和罪恶感”^[30]。“为了求生,人试图逃避自由……因为他忍受不了孤独的滋味,他宁愿失去自我。因此,自由又使人再度套入新的枷锁中。”^{[36]133}

中国传统家庭构建了一个价值体系,个人在这个体系中能够确定自己的身份和生活目标,从而获得生活的满足感和意义。现代“陌生人”社会中人

与人之间的关系大多超出血缘关系辐射的范围之外,社会交往主要是人与他人特别是素昧平生的陌生人之间的交往。由于人与人之间缺乏应有的团结、互助和友爱精神,每一个人都可能成为自己潜在的竞争者,人与他人的关系变得疏远了。家庭虽然还在,但亲情远不如以前,虚情假意,已经不能再推心置腹,互诉衷肠了。夫妻同床异梦,各怀鬼胎,兄弟相残,亲兄弟明算账,反目成仇让很多人痛苦不已,但又无处诉说。因此,进入现代社会后,中国人更加自由了,但人与人之间真情实感的交往和沟通少了。社会交往中人们互不信任和真情实感的减少,必定使整个社会笼罩在寡言少语的境地。孤独和离群索居以获得灵魂的恬静成了现代中国人的一种选择。但长期的孤独和离群索居使中国人往往变得无所适从,产生强烈的精神焦虑和震荡,其结果就是现代人生存意义的坍塌。现代中国人可以声色歌舞、纵情欢乐,但难以摆脱内心的孤独和焦虑。

自近代以来,中国人对自由的激进追求破坏了传统家庭的伦理规范和价值体系,但未能构建新的伦理道德框架来引导和支撑人生的意义与追求。从而导致现代中国人的无根生存,即“离‘家’出走后”的一种飘零生存状态。“离”家进入现代社会后,人与人之间的冷漠与紧张,孤独与焦虑成了现代中国人的一种基本生存状态。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外面的世界也很无奈。自由的现代性使很多人心身疲惫,不堪重负,由此引发的抑郁和自杀行为不断增多。现代中国人表面上生活精彩纷呈,其实无家可归的痛苦却是很多人真实的心灵写照。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质疑和否定近代以来激进自由的后果和现代生活方式。张祥龙就批评说:“五四新文化运动对家庭的批判没有什么合理性,他们的批判一点儿积极意义都没有,他们要毁灭中国的家庭,为的是毁灭中华文化精神的主流也就是儒家,导致了对人类家庭的藐视,这是中华民族的悲哀”^[38]。

三、寻绎回“家”的路:新型家庭责任伦理的构建

当代中国人生存困境的原因就是阿多诺所说的现代社会的“爱无能”^[39]。家庭是爱的摇篮,人类最纯真的爱源自于家庭。现代中国人离“家”出

走后,也就失去了最纯真的家庭情感的关爱。新时代中国人生存现代性后果的救赎,需要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指导作用,在尊重个人权利的基础上,调和自由与责任的关系,推动传统家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构建新型的家庭伦理。

1. 消解自由的现代性需要构建新型家庭伦理

爱的情感需求是人类本性需求,培育人的爱的情感是克服自由的现代性困境的有效方式。“爱,一般说来,就是意识到我和另一个人的统一,使我不专为自己而孤立起来。”^{[28]175}爱可以打破使人与人分离的屏障,将个人和他人联合起来,从而使人克服分离和孤独。因此,黑格尔说:“爱的第一个环节,就是我不欲成为独立的、孤单的人,我如果是这样的人,就会觉得自己残缺不全。”^{[28]175}弗洛姆指出:“爱是人类的一种积极力量。这是一种把隔离人及其同伴的大墙摧毁的力量,也是一种把一个人与其他的人结合在一起的力量;爱使人克服寂寞感和孤独感。”^[30]

培育人爱的情感首先要从家庭开始。爱是人内心所持有的与所爱对象结合为一体的意愿,“爱的奉献”不能强制,正如阿多诺说:“对爱的颂扬——在可能的地方则采取命令式,即人们应该爱——本身就是那种使冷漠永恒化的意识形态基石。这基石是那种带有强制性的、压迫性的东西所特有的,它们正是对爱的能力的抵制。”^{[29]67}如果人在强制中被迫去爱别人,这种爱更像是一种表演。只有发自内心的爱才是积极和真实的爱,这种爱的情感培育必须首先从家庭开始。因为,人的爱的情感首先是在同自己有血缘关系的父母兄弟的接触与交流中发生的。血缘关系是一种自然存在的人际关系,是类群体中最本真的关系,比起其他所有人际关系都有着先在本源性和更强的情感归属的特点。所以,根基于血缘亲情的爱才是最真挚而牢固的。儒家发现了人的伦理道德情感形成的逻辑才主张“立爱自亲始”(《礼记·祭仪》)。儒家认为不能爱自己亲人的人也不会真正地爱别人。亲人之间的爱是出于人的天然本能。孟子说:“孩提之童,无不知爱其亲”(《孟子·尽心上》),所以儒家的仁爱之情首先落实于父母亲人之间。家庭的“爱”不是通过“契约”建立的,而是超越契约的一种最本真的,发自内心的,毫无掩饰和伪装的真情实感。家庭在人的爱心发展中具有根源性的地位,充

满爱的家庭是人的爱心生长发育的“土壤”。在家庭生活中,儿童以被爱为基础,以爱父母和兄弟姐妹为前提逐渐培养起来的人的真情实感。

人的责任伦理首先在充满爱的家庭生活中产生,然后才能再扩展到社会与国家。“家庭是学习自我牺牲和自我克制精神的课堂,是至高无上的道德圣地。”^{[40]28}梁漱溟指出,“家庭乃最能安慰培养人的性情者”^{[41]315-316}。家庭中爱的高度超越性,决定了家庭成员之间责无旁贷的关系,使家庭成为人情道德的温床,个人安身立命的港湾,所有的诗和远方都不及家的温暖。“人类最强烈的情感,人类觉得最幸福、最痛苦的事情,还是与家庭有关,所谓最幸福的事情就是家庭圆满,最痛苦的事情就是失去亲人和家族灭绝。”^[38]“无论时代如何变化,无论经济社会如何发展,对一个社会来说,家庭的生活依托都不可替代,家庭的社会功能都不可替代,家庭的文明作用都不可替代。”^[42]正因为如此,作为对近代以来对家庭批判的反思,张祥龙先生指出:新文化运动的诸君“批判中国家庭,往往要举西方人的个体契约式家庭为对照,认为后者尊重个体,所以从质上更佳,前者则被说成是压抑个人自由发展,因而低劣得死有余辜。到今天,情况已经比较清楚,他们主张的个体自由并不会止步于自由结合建立的家庭,而更要进一步实现超真态家庭的自由,如同性组成家庭的自由,甚至是破坏家庭的自由,像随意离婚——同时意味着伤害幼小子女——的自由、单亲家庭的自由、不结婚只同居的自由、不要后代的自由等等。”^{[43]59-60}近代以来中国人自由追求和对家庭的批判的历程经历了豪迈的离家,悲凉的漂泊,最终又忧伤地归来。

2. 构建新型家庭伦理需要调和自由与责任的关系

自由是人的生命活动的本质诉求和体现。同自由一样,责任也是人的生命活动的本质需要,人要保持自己的生存、体现自身的价值,就离不开责任的承担。马克思指出:“作为确定的人,现实的人,你就有规定,就有使命,就有任务,至于你是否意识到这一点,那都是无所谓的。这个任务是由于你的需要及其与现存世界的联系而产生的。”^{[44]328-329}“不论我做什么,我都不能在哪怕是短暂的一刻脱离责任,因为我对我的逃离责任的欲望本身也是负有责任的。”^{[45]140}“义务所限制的并不是

自由,而只是自由的抽象,即不自由。义务就是达到本质、获得肯定的自由。”^[28]人们在家庭关系中占据特定的位置,随之承担相应的家庭责任,这些责任是由家庭关系和个人地位决定的,不受个人意志的转移。一个自觉自主的人应该对自己的行为和家庭成员负责。只有当个人真正承担起这些责任时,才能促进自身的成长,实现生命的价值,并确保家庭生活的和谐。为了维持家庭的稳定与和谐,每个家庭成员都应当履行他们应尽的基本责任。近代以来中国人激进自由诉求对传统家庭伦理批判的最大问题之一就是自由与责任的割裂。这首先表现为人们只要自由,不讲责任,导致个性自由的恶性扩张,并由此引发家庭与社会伦理道德的沦丧。本来尊崇自由、重视权利是人的正当诉求。但是,当自由与责任被割裂,导致人际关系变得冷漠和责任感的缺失,这不仅阻碍了个体自由的发展,甚至对现代中国人的生存构成了威胁。同样,传统家庭伦理过分强调责任而忽视自由,用责任来削弱自由,或者以责任为名侵犯个人自由,也是不可接受的。责任感是人的核心价值之一,人应当具备责任感,但承担的责任不应被无端增加或过度强化。任意增加家庭责任会破坏个人自由与责任、权利与义务之间的平衡,侵害家庭成员的自由权利。历史和现实中的许多例子都显示,没有自由限制的责任和没有责任限制的自由,对社会都是有害的。

实现责任与自由的平衡需要允执两端,求中致和,对两者之间的割裂进行整合。“自由和责任是一对孪生概念。离开自由没有责任,离开责任没有自由。”^[46]实现个人自由的前提是,个体必须生活在由众多成员组成的家庭里;试图在与他人或家庭隔绝的状态下寻求自由不仅是不现实的,甚至维持生存也将变得极为困难。因此,个人的自由必须建立在与家庭的关系基础之上。为了获得自由,个人需要对家庭负责,并在帮助家庭成员实现自由的同时实现自己的自由。只有当个人与家庭相互履行责任时,自由的实现才成为可能。自由的存在是有界限的,这些界限体现在个人对家庭承担的责任上。真正的自由是受责任限制的自由,只有当个人承担起这些责任时,真正的自由才能够得以实现。因此,“一个人自由选择了某种责任,就是自由地选择了不自由”^[47]¹⁵⁸。承担对家庭成员的责任,才能够消除自由的虚幻面,从而实现真实而积极的自由。

如黑格尔所说:“义务所限制的并不是自由,而只是自由的抽象,即不自由。义务就是达到本质、获得肯定的自由。”^[28]

3. 以责任伦理培育为中心构建新型家庭伦理

在当前中国家庭中自由与责任关系的失衡,要求我们应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指导,构建新型家庭责任伦理,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指导,推进传统家庭责任文化的现代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同时以培育新型家庭生活方式为目标,构建新型家庭责任文化传承发展的多元推进机制。

(1)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指导,推进传统家庭责任伦理的现代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构建新型家文化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指导,“要处理好继承和创新的关系,重点做好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48]。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由于它顺应了全球文明发展的普遍趋势、中国社会进步的客观需求和广大人民的正当需求,是中国传统家庭伦理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选择标准。新时代中国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指导,吸收借鉴现代人类普遍文明成果,推动传统家庭伦理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重点要从四个方面着手。

一是对父母“孝道”责任伦理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孝道”责任伦理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元意识,是伦理道德的根本。“孝道”作为传统责任伦理,既包含了封建社会中维护等级制度、特权和专制的陈旧成分,也融合了反映人生和社会规律的科学要素。因此,新时代构建新型家庭责任伦理要深刻挖掘传统“孝道”责任伦理的历史内涵,在尊重传统“孝道”责任伦理内核精神的基础上,对其进行辩证分析,将孝道精神从传统社会的单一范畴扩展至更广泛的“仁义礼智信”概念,并延伸至诚信、责任、服务和使命等层面。特别是要顺应新时代的要求,把由体现家族主义的传统“孝道”责任伦理转变为尊重个人权利的现代“孝道”责任伦理。

二是对夫妻“忠诚相爱”责任伦理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夫妻者,非有骨肉之恩也,爱则亲,不爱则疏。”(《韩非子·备内》)要保证夫妻忠诚相爱,首先要相互尊重。古人将相互尊重表述为“相敬如宾”,这是夫妻恩爱首要的伦理原则。在当今社会,男女平等已经取代了男尊女卑的观念,因此传统的夫妻相处之道“相敬如宾”已经演变为“相互尊重”。这种相互尊重要求夫妻双方都要尊重对

方的人格和尊严,并在相互敬爱的基础上建立关系。这不仅是对传统优秀夫妻伦理的继承和总结,也是现代家庭伦理建设中应当弘扬的价值观。此外,相互奉献是夫妻关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它是无私的爱和全心全意的付出的体现,应当成为夫妻责任伦理的核心追求。和谐的夫妻关系依赖于双方的相互奉献,如果把婚姻比喻为一株花,那么只有靠夫妻双方共同的辛勤浇灌,才能绽开芳香、美丽的花朵。婚姻中的幸福也需要夫妻双方的共同努力和奉献。在现代家庭中,夫妻间的奉献是最基本也是最关键的责任。传统的奉献观念包含积极和局限两个方面,我们应当鼓励积极的奉献精神,同时摒弃那些不平等的、带有封建色彩的奉献模式。在过去的家庭结构中,往往是丈夫主导而妻子从属,所谓的“相敬”主要是强调妻子对丈夫的尊重,而现在我们提倡的是双方平等的相互尊重。

三是对子女“教养”的责任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在家庭教育中,父母始终承担着不可替代的责任,对未成年子女的成长和福祉负有最重要的责任。以确保父母履行其职责和义务、维护子女最佳利益为核心的子女本位立法,已经成为全球多数国家在亲子关系立法中的主导趋势。父母需要肩负起培养其子女“学会学习、学会做事、学会与人相处、学会做人”的责任。孩子的第一个学习场所是家庭,而他们的启蒙老师则是父母。家庭教育的质量和效果不仅影响孩子的一生,也牵动着每个家庭的福祉,并且对国家和民族的长远发展具有深远的意义。要明确家长在家庭教育中的主体责任,家庭中父母的责任有四个方面被保留和积淀下来,即家庭教育主体责任的延续、家国情怀的传承、崇知重德观念的循守、文化习俗的沿袭四个主题,分别展示了我国百年来家庭教育的责任主体和责任内容的文化传承。父母教养子女要公平,不能重男轻女,带着偏爱。

四是对兄弟姐妹之间互帮互助责任伦理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兄弟姐妹因血缘关系紧密相连,在共同成长的过程中,很自然地培养出彼此关心、相互扶持、相互信赖的深厚情感。传统社会形成的“兄友弟悌”的责任伦理,强调哥哥应具有慈爱和友善的品质,弟弟则应表现出尊敬和服从的态度。然而,这种伦理观念是建立在长幼有序的基础之上的,兄弟之间并非完全平等。在继承权和发

言权方面,哥哥相对于弟弟和妹妹拥有特殊且优先的地位。所以要对其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在平等的基础上,兄弟姐妹之间要相互忍让,形成团结亲密,互帮互助的新型责任伦理,并将之推广至社会,便会形成礼貌敬让的风尚。

(2)以培育新型家庭生活方式为目标,构建新型家庭责任伦理传承发展的多元推进机制。新型家庭责任伦理不只是一种精神理念,更是一种生活方式。构建家庭责任伦理需要培育现代家庭生活方式,让家庭责任伦理深入到生活的细微之处,使之成为家庭成员内心的自觉追求和外在行为的自然表现,从而在人们的自我认知和行动中悄无声息地起到引导和塑造的作用。因此,新型家庭责任伦理必须成为人们进行身心修养和追求内在超越的道德律令,成为人与人之间交往的行为规范。要达到这一目标,在很大程度上需要构建相关的制度和机制作为中介担保。

一是构建新型家庭责任伦理的研究、宣传和教育机制。传统家庭责任伦理要持续保持其活力和相关性,就必须与时俱进,通过现代的理解和思考方式对其进行重新诠释和表达。在新时代要深入阐发优秀传统文化责任伦理,寻绎传统家庭责任伦理现代转化的合理路径,制定传统家庭责任伦理转化的选择标准,对传统家庭责任伦理做出合理选择,吸纳各国现代责任伦理发展的积极成果,融会贯通,构建中国的新型家庭责任伦理。同时还要构建家庭、社会与学校之间的协同宣传和教育机制,对新型家庭责任伦理进行宣传和传播。

二是构建和优化新型家庭责任伦理发展和实践的组织领导机制、政策保障机制和法治保障机制。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切实把新型家庭责任伦理传承发展和实践机制的构建纳入文化发展的宏观规划之中,党委宣传部门要利用枢纽位置,协调整合相关资源力量,以推动形成党委领导、政府主导、社会参与的新型家庭责任伦理发展和实践的工作体系。具体可制定专项财政支持政策,出台新型家庭责任伦理实践相关领域和部门之间的合作共建政策,出台新型家庭责任伦理实践的激励表彰政策。通过相关法律法规的立法工作,在科教文卫体和城乡建设等领域立法及修订相关的法律法规,对新型家庭责任伦理实践作出制度性安排,加大涉及新型家庭责任伦理实践等方面的执法力度。

三是激活新型家庭责任伦理实践的主体力量。引导人们认识到新型家庭责任伦理建设和实践是全社会共同的责任,充分尊重人民在新型家庭责任伦理建设和实践中的主体地位,党的领导干部要发挥带头作用,社会公众人物要发挥示范作用,青少年要发挥生力军作用,先进模范人物要发挥表率作用,以此来带动越来越多的人成为新型家庭责任伦理建设和实践的积极力量。

四、结 语

家是生命的摇篮,是道德情感的温床,是人安身立命的港湾,是现代中国人实现美好生活的根基。中华民族以重家和尊家的传统形成了深厚的家庭伦理和“家国一体”的价值观念,这是支撑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绵延发展的强大精神力量。近代以来中国人对传家庭伦理的激进批判,导致家庭功能不断弱化,进而引发一系列严重的后果。今天中国人口再生产的困境、道德滑坡、家国情怀的淡化等一系列问题,都可以从家庭功能的弱化找到根源。台湾歌手潘美辰的《我想有个家》唱出了现代中国人的心声,虽然很沧桑伤感,但由于触动了很多人漂泊的心灵,让人百听不厌。渴望“回家”是现代中国人的理性诉求,新时代我们要增强新型家庭伦理建设和实践的目的性和自觉性,以提升新型家庭责任伦理的建设和实践的成效。

参 考 文 献

- [1] 习近平. 在2015年春节团拜会上的讲话[N]. 人民日报, 2015-02-18(02).
- [2] 习近平. 千家万户都好国家才能好[N]. 人民日报, 2018-02-16(02).
- [3] 陈建洪. 如何理解儒“家”的当代复兴?[J]. 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1, 61(3): 120-127.
- [4] 张再林. 以“家”为范式的中国传统文化[J]. 江苏行政学院学报, 2019(5): 24-30.
- [5] 孙向晨. 论中国文化传统中“家的哲学”现代重生的可能性[J]. 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4, 56(1): 55-64.
- [6] 瞿同祖. 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M]. 2版. 北京: 中华书局, 2003.
- [7] 郑曦原, 李方惠. 通向未来之路: 与吉登斯对话[M]. 成都: 四川人民出版社, 2002.
- [8] 鲁迅. 鲁迅全集: 第1卷北京[M].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5.
- [9] 陈独秀. 一九一六年[J]. 青年杂志, 1卷5号.
- [10] 陈独秀. 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J]. 青年杂志, 1卷4号.
- [11] 胡适文存(卷四)[M]. 亚东图书馆, 1926.
- [12] 胡适. 尝试集[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0.
- [13] 傅斯年. 万恶之源[J]. 《新潮》创刊号, 1919(1).
- [14] 鞠普. 毁家谭[M]. 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 第3卷. 上海: 三联书店, 1977.
- [15] 高力克. 五四的思想世界[M]. 上海: 学林出版社, 2003.
- [16] 汤森, 沃马克. 中国政治[M]. 顾速、董方, 译.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
- [17] 中共凤县县委. 关于婚姻法执行情况的检查和今后部署的报告(1953-01-25)[Z]. 西安: 陕西省档案馆, 档案号: 123-1-7439.
- [18] 中共甘泉县委. 贯彻婚姻法运动总结(1953-04-06)[Z]. 西安: 陕西省档案馆, 档案号: 123-1-7432.
- [19] 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 贯彻婚姻法宣传要点(1953年3月21日)[Z]. 西安: 陕西省档案馆, 档案号: 123-3-175.
- [20] 榆林区贯彻婚姻法运动委员会. 宣传贯彻婚姻法运动月工作总结(1953年5月30日)[Z]. 西安: 陕西省档案馆, 档案号: 123-3-175.
- [21] 卡尔·波兰尼. 大转型: 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M]. 冯钢, 刘阳, 译. 杭州: 浙江人民出版社, 2007.
- [22] 梁漱溟. 梁漱溟全集: 第2卷[M]. 济南: 山东人民出版社, 2005.
- [23] 陆洋. “能多自由就多自由”[J]. 齐鲁周刊, 2017(12): 12.
- [24] 文森特·帕里罗. 当代社会问题[M]. 周兵, 等译. 北京: 华夏出版社, 2002.
- [25] 乌尔里希·贝克, 伊丽莎白·贝克·格恩斯海姆. 个体化[M]. 李荣山, 范譞, 等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1.
- [26] 托夫勒. 未来的冲击[M]. 孟广均, 等译. 北京: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1985.
- [27] 约翰·奈斯比特. 大趋势: 改变我们生活的十个新方向[M]. 梅艳, 译.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4.
- [28] 黑格尔, 法哲学原理[M]. 范扬, 张企泰,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61.
- [29] 霍克海默, 阿多诺. 启蒙辩证法[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3.
- [30] 弗罗姆爱的艺术[M]. 康革尔, 译. 北京: 华夏出版社, 1987.

- [31] 霍布斯. 利维坦[M]. 黎思复, 黎廷弼,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5.
- [32] 安东尼·吉登斯. 现代性的后果[M]. 田禾, 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00:30.
- [33] 褚添有. 社会冷漠症形成的根源及其矫治[J]. 江苏行政学院学报, 2017(6): 64-71.
- [34] 张善根. 从互害型社会走向互利型社会——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及应对[J]. 探索与争鸣, 2018(8): 75-83, 142-143.
- [35] 斐迪南·滕尼斯. 共同体与社会: 纯粹社会学的基本概念[M]. 林荣远,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9.
- [36] 埃里希·弗洛姆. 逃避自由[M]. 哈尔滨: 北方文艺出版社, 1987. 44-45.
- [37] 弗罗姆. 对自由的恐惧[M]. 许合平, 朱士群, 译. 北京: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1988.
- [38] 张祥龙, 张恒. 家的本质与中国家庭生活的重建——张祥龙教授访谈录[J]. 河北学刊, 2018, 38(3): 1-8.
- [39] 特奥多·阿多诺, 孙文沛. 奥斯维辛之后的教育[J]. 现代哲学, 2015(6): 61-69.
- [40] 埃米尔·涂尔干. 社会分工论[M]. 渠东, 译.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0.
- [41] 梁漱溟. 梁漱溟全集: 第2卷[M]. 济南: 山东人民出版社, 2005.
- [42] 习近平. 在会见第一届全国文明家庭代表时的讲话. [EB/OL]. 求是网. [2019-07-01]. http://www.qs-theory.cn/2019-07/01/c_1124695191.htm.
- [43] 张祥龙. 家与孝: 从中西间视野看[M].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7.
- [44]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60.
- [45] 萨特. 他人就是地狱: 萨特自由选择论集[M]. 周煦良, 等, 译. 西安: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3.
- [46] 谢文郁. 自由与责任: 一种政治哲学的分析[J]. 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0, 40(1): 182-195.
- [47] 赵汀阳. 论可能生活[M].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4.
- [48] 把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凝魂聚气强基固本的基础工程[N]. 人民日报, 2014-02-26(01).

From Leaving “Home” to Returning “Home” ——On the Modernity Consequences and the Ethical Salvation of Chinese Family criticism since Modern Times

LV HUI

(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Shaaxi Normal University; Xi'an, Shaanxi 710064)

Abstract: In order to pursue personal freedom and liberation, the Chinese people have fiercely attacked traditional family ethics with a radical attitude since modern times, thus leading to the continuous weakening of the traditional family function without the establishment of a new family ethics in reality. Due to the weakening of traditional family functions and the lack of a new family ethics, it is difficult for Chinese people who are wandering in a modern society of strangers to find the comfort of true feelings. The indifference and tension between people has made loneliness and anxiety a basic state of life for of modern Chinese people. The demand for moral feelings is the demand of human nature, and the family is the foundation of cultivating human moral emotion. In the new era, Chinese people need to give full play to the guiding role of socialist core values, reconcil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reedom and responsibility, constantly promote the modernity transformation and innovative development of the traditional family responsibility ethics while returning to nature and being brave in innovation, and construct a new code of family ethics with responsibility ethics as the centered. At the same time, it is necessary to build a diversified promotion mechanism to practice the new family responsibility ethic and to make it really permeate into the family life of modern Chinese people.

Key words: family; freedom; modernity; ethics of responsibility

【编辑 王思齐】